

茶马古道
跨越巅峰的生活



云南省商务厅百年滇商丛书编委会

熊清华 主编

滇西北商人

周智生 李灿松 著

卷四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

滇西北商人

周智生 李灿松 著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滇西北商人 / 周智生, 李灿松著. -- 昆明 : 云南人民出版社, 2013.4
(百年滇商)
ISBN 978-7-222-09634-9

I. ①滇… II. ①周… ②李… III. ①商业史—云南省 IV. ①F72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073528 号

责任编辑: 尹 杰 王曦云
装帧设计: 钊祚伟 李 蕾
责任校对: 骆 兢 胡本常
责任印制: 陆卫华

书 名	滇西北商人
作 者	周智生 李灿松 著
出 版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
发 行	云南人民出版社
社 址	昆明市环城西路609号
邮 编	650034
网 址	www.ynpph.com.cn
E-mail	rmszbs@public.km.yn.cn
开 本	787x1092 1/16
印 张	12
字 数	142.8千
版 次	2013年5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印 刷	昆明卓林包装印刷有限公司
书 号	ISBN 978-7-222-09634-9
定 价	48.00元

本书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云南山地族群社会共生系统形成机理研究”（41161027）、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项目“云南多民族经济共生关系发展研究”（NECT-10-0974）支持研究成果之一。

云南省商务厅 百年滇商丛书编辑委员会

主 任 熊清华

编 委 杜 勇 李极明 王开良 杨 慧

朱晓阳 赵 平 王建伟 孙 燕

朱 非 杜俊军 马永福 周学文

林超民（特聘） 木霁弘（特聘）

摄 影 周智生 李灿松 木霁弘 李 维

李德佑 方震东 杨海潮

总序

回望和弘扬百年滇商的宝贵遗产

云南省商务厅厅长
经济学研究员

熊清华

1840—1940 年的一百年间是中国社会急剧变化发展的时期，资本主义的入侵和内在资本要素的发育，对中国传统社会结构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和震荡。就其原因来讲，外因和内因都很重要，它的相互碰撞和新生。外力的冲击加速了内部的变化，这些变化为商业的发展带来了诸多的连锁反应，如户籍管理制度的弱化、西学东渐、工具时代的技术进步、交通条件的改善等因素，为中国各地民间商业活动的复兴提供了条件、空间和舞台。在这个大时代，云南的商业也不可避免地受到了与世界息息相关的冲击和震荡，一批影响深远的商人和商帮在这时期脱颖而出，一系列云南的品牌也在这期间诞生、发展和壮大，相应的商业文化、理念、精神也相伴而生。对“百年滇商”的梳理、书写与重构，实际上就是通过对 1840 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社会发展和变迁的一个重要侧面的回望，从而把滇商文明挖掘出来、传承下去。

相对于以汉文化为中心的核心区域而言，云南是边疆，曾是蛮荒和落后的代名词，但是，另一面的价值则在于云南不仅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而且还具有重要的地缘价值，往南可通东南亚，往西可通南亚，往北、往东可接中国腹地。从文化地图上讲，云南还地处汉文化和印度文化之间的



通道上，而这两个古老的文明在自然资源及产品上有很多互补的地方；由于地利之便，云南的商人与印度、与越南、与缅甸等国家进行国际贸易的时间要远远早于中原地区，这些商贸往来不仅带来了物资的流动，也带来了文化的交流，这个视角聚焦之下的云南代表的则是开放与前沿。回顾1840—1940年间云南商贸的发展，可以更清楚地探究云南所具有的这种双重理性。

凡到过云南的人都知道，云南境内山多路险，地形错综复杂，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商业运输几乎全靠人畜之力，加之云南盛产良马，于是马帮便成为最方便、最经济的运输形式。云南特有的茶叶、盐巴、烟草、玉石就是靠这样的形式运输出去与市场消费连接的。与平原地区相对先进的运输形式相比，这无疑是一种低效率的运输形式，带来的利润也是如此，无法选择其最大化。而另一方面，这种运输方式也成就了云南许多著名的独特商帮，成就了云南商人吃苦耐劳、笃守信誉的优良品格。这些古道虽然早已冷清，马帮铃声已经远去，但是沿途高山河谷打磨出来的云南商人的宝贵精神至今犹存，尘封而不失光彩。

19世纪末，是一个结束与开始、发展与扬弃的时代。1887年，蒙自开辟为云南对外开放的商埠，1889年，蒙自海关落成并正式开关，成为云南的第一个海关；1910年，滇越铁路建成通车，把云南的河口、蒙自、昆明三个通商口岸连在一起，于是，云南80%以上的进口物资便通过滇越铁路在蒙自转运。另一方面，在蒙自开关后，洋纱、布匹、日用百货等进口商品大举进入，进口大增，全省21个府厅中有20个府厅、93个县，以及贵州、广西、四川、湖南都从蒙自口岸进口商品以满足市场。滇越铁路是云南的第一条铁路，也是中国的第一条国际铁路，它拉开了云南的近代化序幕，加速了云南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的转化和社会走向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进程，当然，也改变了云南几千年来偏远闭塞的历史，对云南社会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上述情况，从历史唯物论的角度讲，有着一定的必然性，而且有一个渐进的演变过程。翻开明清时代的历史，我们不会忽视在社会经济出现的一种十分引人注目的现象，这就是地方商帮和大商人资本的兴起，其中著名的有山西、徽州（安徽黄山地区）、陕西、福建、广东、江右（江西）、洞庭（苏州市西南太湖中洞庭东山和西山）、宁波、龙游（浙江中部）、

山东十大商帮，而又以晋帮（山西商帮）、徽帮（安徽商帮）最为著名。在这一时期，地处中国西南边陲的云南也出现了几大商帮，如“腾冲商帮”、“鹤庆商帮”、“喜州商帮”等等。与国内的一些商帮相比，这些商帮可能小一些，但却具有地域性和民族性的重要的典型特征，这些商帮为云南的商业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也为中国优良的商业传统和精神提供了宝贵的内容。

这几年陆续播出了以明清商人为原型或商业活动为背景的《胡雪岩》、《乔家大院》、《大宅门》、《昌晋源票号》、《驼道》、《钱王》等多部电视剧。其中，《乔家大院》讲的是勤俭持家、注重信用的乔致庸的故事；《大宅门》讲的是同仁堂的前身、专供药于官家的百年老号百草厅白氏家族的兴衰；《钱王》描述了艰苦奋斗、奔波劳累以德服人的清末红顶商人王炽的传奇一生。我之所以专点这三部，不是说这三部最好（当然很好），而是说它分别讲述了中国三个省份的商人代表，乔致庸是晋商的代表，白景琦是京商的代表，王炽则是滇商的代表。我以为，云南商人最是心系家乡的公益事业，最是关心国家的命运，从弥勒商人王炽到宣威商人浦在廷、大理商人李琢庵、保山商人梁金山、腾冲商人寸玉亭，他们无不积极投身于社会大潮之中，捐出自己的财产，为社会变革贡献自己的力量，这确实是云南的一大商业精神。近现代云南商业的发展，深刻地影响到了云南各地、各民族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该套丛书的出版可说是对“百年滇商”商贸遗产做的总结、梳理及研究。尽管我们能力不及，但这毕竟是云南省商务厅及云南大学茶马古道文化研究所长期酝酿多年研究的成果展现，旨在缅怀商界前辈、弘扬滇商精神、追思商脉过往、传承滇商文化。丛书对云南经济文化研究，特别是商务文化建设做了一项填补空白的工作，相信该丛书会使更多的人关注滇商的发展。



前言

滇西北一般意义上包括云南迪庆藏族自治州、丽江市、怒江傈僳族自治州、大理白族自治州。这一区域位于青藏高原南缘，横断山脉西南腹地，滇、川、藏三省（区）交界处，地势险要，是扼藏联蜀的重要区域，也是中原文化与少数民族文化交融的重要区域，是由云南进入西藏、四川、青海等地藏区的门户。同时，滇西北地区也是中国联结缅甸和印度、面向南亚东南亚地区的重要链环，有着重要的战略价值。

滇西北地势险要，山谷纵横交错，在这险要的高山深壑之间，散布着极少的平地——坝子。这一区域垂直地带性明显，垂直带谱明显，用当地的谚语来描述就是“一山有四季、十里不同天”。就在这不同的垂直带谱上居住着不同的古老民族的后裔，这些少数民族千百年来由于征战、迁移等外在因素，千百年来形成了自成体系的文化习俗，并交错散布在坝子、半山区和山区之间。自古以来，为了维持生存和发展生产的需要，居住于坝区、半山区、山区的各民族群体之间自发产生了物资的交换。多民族间的这种“经济活动绝不是由目的性所维系的，而是主要由人类的普遍无意识或永久的象征系统决定的”。^①正是这种无意识的经济行为使坝区和山区不同民族群体之间物资交易长期存在，成为了维系人们基本生活的重要形式，而民族商人便是这一重要形式的主要维系力量。

滇西北地区是历史上古代氏羌民族迁徙的主要通道和民族分化的核心区域，民族之间依存度高，族际经济互动频繁。由于其特殊的地理环境，复杂的地形地貌，加之各民族生产生活的需要而衍生出专门从事商业活动的群体——民族商人。民族商人在滇西北地区的商贸活动历史悠久，在唐

^① 栗本慎一郎：《经济人类学》，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13页。



宋时期白族先民就已经开始在这一区域从事商贸活动，清中期以后得到长足的发展。十九世纪末期，伴随着通商口岸的开放，云南的对外开放发展与商业经济迎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勃兴时期。商人、商帮大量涌现，其发展规模空前扩大，出现了大批专门在滇西北以及深入西藏、四川、青海等地藏区进行商事贸迁的坐商和行商。这一时期云南商帮云集，各地商人群体茁壮发展，他们几乎成为引领整个近代云南商业贸易发展甚至社会经济生活变迁的中坚力量，并对区域近代社会变迁产生深远而广泛的影响。

本书所阐述的“滇藏贸易”有两个基本方面的特定含义：一是关于地理范围。“滇藏贸易”指的是云南和西藏、四川、青海等广大藏区之间数千年持续不绝的贸易往来关系，这也是云南和中国西部川、青、藏等民族地区间重要的跨省际经贸联系方式。二是关于贸易关系，本书所说的滇藏贸易关系是云南与川、青、藏等藏区间双方通过商人民间自发形式实现的商贸交流关系。

近代滇西北商人群体以下关、丽江、中甸（香格里拉）为中心，沿滇川、滇藏印、滇缅等沿线铺开，在滇藏川等地区 and 内地甚至国际进行双边贸易，其商贸活动主要将内地或国外运来的货物运送到下关后，在滇西北以及滇川藏交接区的各少数民族聚居区销售，有的直接运送到康定、昌都、拉萨，而大部分则是由于交通阻滞、文化分野和信息交流不畅造成经过不同民族区域时存在着分阶段转运接力传递。从大范围的滇川藏印的整体贸易来看几乎所有的商号经营都是“分阶段转运接力传递”，而滇西北的商人和商帮便是这场近代滇藏“国际商贸接力赛”中的中坚力量。

历史上白族商人、纳西族商人、藏族商人是滇西北地区商贸活动的主要群体，他们的经营活动对滇西北地区经济社会影响持续而深远。甚至在某些历史时期，还成为促进这些地区民族社会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之一，成为维系近代中国西南边疆社会稳定发展的主要纽带。同时族际间的经济交流促进了民族间的文化交流，加强了滇川藏等地区民族团结，客观上形成了区域和谐发展的良好局面。从其整个发展历程而言，滇西北商人与商帮的萌芽、发展、形成、兴盛与衰落均与族际经济交流与区际物资的流通有极大的关系，而滇藏贸易是滇西北商人与商帮发展过程的主要活动舞台，可以说没有滇藏贸易就不会有滇西北商人的产生和勃兴。因此，滇藏贸易与滇西北商人商帮的发展历程息息相关，梳理滇藏贸易的历史发展进程，

回顾滇藏贸易演进背景下滇西北商人风起云涌、跌宕起伏的发展历程，揭示滇西北商人成长聚合与滇藏区域性经济联动之间的内在机理，总结历史发展的宝贵经验，面对今天的云南如何更好地实现对外开放发展与民族和谐团结关系的建构需要，便显得尤为重要而有意义。





总序 / 熊清华

前言

第一章 历史上的滇藏贸易发展历程

第一节 滇藏贸易的发展历程 4

第二节 滇藏贸易的功能及意义 23

第二章 近代滇西北商人的勃兴

第一节 近代滇西北商人群体发展的历史条件 30

第二节 滇西北商人的发展进程 39

第三节 滇西北商人资本的运动 63

第三章 近代滇西北商人推动下的滇藏贸易

第一节 滇西北商人与近代滇藏贸易的繁盛 83

第二节 滇藏贸易与近代民族地区的经济生活 99

第三节	滇藏贸易与近代区域市场体系的构建	108
-----	------------------------	-----

第四节	近代滇藏商贸与民族地区的农牧业生产	127
-----	-------------------------	-----

第四章 滇西北商人聚合机理研究

第一节	滇西北商人的聚合	138
-----	----------------	-----

第二节	滇藏贸易演进背景下的滇西北商人聚合机制	154
-----	---------------------------	-----

第三节	滇藏贸易兴盛发展与民族商人勃兴互动的历史启示	160
-----	------------------------------	-----

参考文献		165
-------------	-------	-----



第一章

历史上的滇藏贸易 发展历程



自古以来，滇藏地区由于地缘邻近、族源相近等关系，各民族之间在日常的生产和生活中不断在经济上形成互通有无、文化上出现相互取长补短的关系。其经济联系可追溯到远古时期，如西藏、云南以及东南亚一些地区，在古代同属“贝币”流行地区。西藏在历史上曾经以贝为币，至今社会上仍保存着贝币，明代云南贝币仍广为流行，此现象表明两地间存在着特定的经济联系。^①文化上的联系可以从各民族固有的文化体系中的相同或相近的一些文化习俗中可以窥见一斑。考古资料证明远自新石器时代开始，滇藏之间在文化上就出现了“显著的共同因素”。^②所以，滇藏间各民族出于日常生产生活的需要而引发的经济、文化上的不断交往，可能在很早的历史时期就已开始。

第一节 滇藏贸易的发展历程

一、滇藏贸易有史记载的开端

由于地缘因素的关系，自古以来，滇西北地区就与西藏、川边等藏区有着密切的联系。有的学者甚至认为至迟从新石器时代，西藏与印度、川西高原、滇西北地区便存在着广泛的经济、文化交流，存在着若干民间小道。^③近代云南学者袁嘉谷先生也曾在其《卧雪堂集》卷二十二中指出：“由蜀道通竺，非滇则藏。”由于滇藏间交流通道很早就已开辟，所以滇藏间各民族的贸易有无，可能在很早的历史时期便已开始了。纳西族古老的东巴经《多格绍》中就曾有这样的记载：“藏族聪本（生意官）马帮九兄弟，赶着九十九个驮子来（纳西族聚居区）。 ”^④

商路的开辟与形成，是贸易得以产生发展的决定条件之一。历史上，丽江为中心的滇西北地区虽然由于崇山峻岭，汹涌江河的阻隔而交通条件非常恶劣，但世代繁衍生息于横断山区、云岭丛中的各族先民，为了在这

① 陈汛舟、陈一石：《滇藏贸易历史初探》，载《西藏研究》1988年第4期。

② 汪宁生：《从文物考古材料看滇藏关系》，载《藏族学术讨论会论文集》，西藏人民出版社1984年。

③ 罗开玉：《从考古资料看古代蜀、藏、印的交通联系》，载《古代西南丝绸之路研究》，四川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43页。

④ 和志武：《东巴经典选译》，云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49页。

恶劣的生存条件下求得生存发展，凭着冲破闭塞而进行的富于智慧和艰苦卓绝的斗争，筚路蓝缕、跨渡江河，开辟了一条又一条横贯云岭高原、翻越青藏高原的生存之路。正是凭藉这些羊肠鸟道，唐代吐蕃大军才得以南下与唐王争夺洱海地区；丽江木氏土司才得以在明代实现对滇藏川边界地区的经营，各民族文化才得以相互交流、碰撞交融。但是，我们却难以把这些民族往来的道路的形成便视为商贸道路的开辟。因为商贸道路的开辟及形成，需要一定的社会条件作为保障。

也许滇藏间的经济文化交流确实很早，但是有籍可考则是在唐代。唐代是滇藏贸易初步发展的时期。相关史料记载了唐代发生在藏东南与滇西北区际经济往来的事实，唐樊绰的《蛮书》中记道：“大羊多从西羌、铁桥接吐蕃界，三千二千口将来博易。”^①樊绰同书卷二中还提到由滇入吐蕃之道：“大雪山在永昌西北。从腾冲过宝山城，又过金宝城以北大賧，周回百余里，……无君长也。……三面皆是大雪山，其高处造天。往往有吐蕃至賧货易，云此山有路，去赞普牙帐不远。”根据方国瑜先生的考证，这一交易地点大概在缅甸北部迈立开江上游大山中的坎底一带。^②可见，滇藏间交易的商品、交易数量及线路均已初步形成。

再者，对滇茶的最早记载亦见于唐代，樊绰在其所著《蛮书》一书中写道：“茶出银生城界诸山，散收，无采造法。蒙舍蛮以椒姜桂和烹而饮之”。^③唐代南诏曾设银生节度，银生城即现在的云南省景东，其辖区即今普洱和西双版纳地区一带，是滇藏茶马古道从产茶地普洱至加工生产地大理的必经之地，说明茶在唐代就已运销到大理地区，为当地的民族饮用。另据清阮福《普洱茶记》分析：“普洱茶不知显于何时，宋自南渡物后，于桂林之静江，军以茶易蕃之马。是谓滇南无茶也。”清人檀萃《滇海虞衡志》云：“顷捡李石《续博物志》，云：茶出银生诸山，采无时，杂椒姜烹而饮之。普洱古属银生府，则西蕃之用普茶，已自唐时。宋人不知，犹于桂林以茶易马，宜滇马之不出也。”^④说明唐代吐蕃已开始饮用普洱茶，普洱茶成为滇藏贸易的重要商品。

透过滇藏经济联系不断发展的史实还需剖析唐宋时期滇藏贸易日具维

① （唐）樊绰：《蛮书》卷7《管内物产》，木芹补注本，云南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25页。

② 参见方国瑜：《中国西南历史地理考释》（上册），中华书局1987年，第553页。

③ （唐）樊绰：《蛮书》卷7《管内物产》，木芹补注本，云南人民出版社1995年。

④ 陈保亚：《茶马古道的历史地位》，载《思想战线》1992年第1期。





形、日渐拓展的历史因素，滇藏商贸活动的发展是与特定历史时期的历史背景密切相关的。

首先，唐代，南诏与吐蕃两个地方政权为扩张领域而发动战争推动了滇藏贸易主要商道的开通，其出发点是为战争服务，主要用于军事，兼运送占领地的进贡物品。约在公元7世纪50年代初，吐蕃势力南下向滇西北扩张，并逐步影响和控制了今云南德钦、中甸、维西和丽江一带，后继续南下用兵西洱河地区（今大理洱海一带），最迟于公元664年即唐麟德元年，吐蕃政权已深入到滇西北和西洱河地区。因为，该年唐王朝为加强原本控制的西洱河地区的稳定，将姚州府升为姚州都督府。^①为了巩固新占之地，吐蕃政权徙大量藏族先民向藏东南、滇西北和川西南等地流动，为滇藏贸易的出现提供了便利的渠道。公元779年冬，吐蕃为实现其“取成都为东府，工技悉送逻娑（拉萨）”^②的战略目标，联合南诏兵二十余万，兵分三路进攻成都，军队的行军过程和所需物品的运送过程也就是滇藏间古栈道的开辟过程，形成了吐蕃与西洱河地区网状式贯穿横断山脉的古栈道。同时，南诏政权为满足自身政治图谋而采取的军事行为客观上也推进了此区域古栈道的发展。唐贞元十年（公元794年），“吐蕃因争白庭，与回鹘大战，死伤颇众，乃征兵于牟寻，须万人。牟寻既定计归我，欲因征兵以袭之，乃示寡弱。谓吐蕃曰：蛮军素少，仅可发三千。吐蕃少之，请益五千，乃许。牟寻遂遣兵五千人戍吐蕃，乃自将数万踵其后，昼夜兼行，

① 赵心愚：《吐蕃入滇路线及时间考》，载《西藏民族学院学报》（哲社版）2004年第4期。

② 马曜主编：《云南各族古代史略》，云南人民出版社1977年，第84页。

乘其不备，大破吐蕃于神川，遂断铁桥。”^①吐蕃败北之后，退至金沙江守其本土。唐大和三年（829年），南诏利用吐蕃无力出战和与唐军联盟的时机大举进攻四川并攻占成都，掳掠大量财物。此后，为战争而开辟的栈道的性质发生了变化，从单纯运送军用物资、战利品的政治通道转变为滇藏民间往来、民间交换的通道。

其次，南诏与吐蕃时好时坏的关系、时断时续的联系为滇藏贸易发展提出了要求。由于唐王朝中央政权对南诏、吐蕃两个地方政权的治略、态度的不同和变化，南诏和吐蕃出于各自利益的考虑，历史上二者间的关系显得非常复杂，时亲时疏。在吐蕃势力扩及今云南大理地区，南诏归附吐蕃时期，吐蕃通过征收赋税、索要贡物等方式推动二者间的经济联系。根据《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墀都松）赞普又推行政令于南诏，使白蛮来贡赋税，收黑蛮归于治下。”“墀（赤）德祖赞普之时，南诏地面，有所谓白蛮子者，乃一不小之酋长部落。赞普以谋略封诏赐之，南诏王名阁罗凤遂归降，前来致礼，赞普仍封之日钟，民庶者归附庸，（吐蕃）地域增长一倍。”^②吐蕃为保证对南诏地区和人民统治治策的实施，交通的畅达是前提条件。据《南诏德化碑》，第一次天宝战争，南诏在吐蕃的支持下大获全胜，“遂遣男铎传、旧大酋望赵佗邓、杨传磨侔及子弟六十人，贡重帛珍宝等物，西朝献凯。属赞赞仁明，重酬我勋效，遂命宰相倚禅叶乐持金冠、锦袍、金宝带、金帐、状安扛伞鞍、银兽及器皿、珂贝珠、毯、衣服、箬马等，赐为兄弟之国。”^③可见，如此大规模人员和贡赐物资的流动完成，足以证明滇藏贸易商道的足以通行并为商贸交流提供了前提条件。

最后，汉文化的传播活跃了南诏经济文化的发展，促进了滇藏贸易的进一步交流。自唐咸通元年（860年）至唐乾符元年（874年）间，南诏四次攻打成都等地，抢夺财物、掳掠工匠和俘虏做为奴隶，主动学习汉文化，极大地促进了南诏农业生产、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南诏设立“禾爽”机构专门管理贸易，较大的贸易城镇有阳苴咩（大理）、大釐（喜洲）、拓东（昆明）、永昌、银生、铁桥，交易产品主要是畜产品和麝香、熊胆、藏红花等药材。

① 《旧唐书·南蛮传》。

② 转引自汪生：《从文物考古材料看滇藏关系》，载《中国西南民族的历史与文化》，云南民族出版社1989年，第204页。

③ 马曜主编：《云南各族古代史略》，云南人民出版社1977年，第717页。

